

汉中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业一级硕士点基金资助

汉唐时期

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

闫续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硕士点基金资助

汉唐时期 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

闫续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中国有着悠久的家教传统,产生了丰富的家训文献,其中由历代帝王和士大夫撰写的家训影响尤为深远。本书在追溯家训起源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较为系统的文献考查、思想内容研究与文体特点分析。汉唐家训中有关个人修身养德、读书治学、仕宦为官等内容有助于个人完善自我、成就伟业,体现出古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本书面向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古代文学修养的社会各阶层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闫续瑞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646 - 1669 - 4

I. ①汉… II. ①闫… III. ①家庭道德—研究—中国—汉代②家庭道德—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324 号

书 名 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

著 者 闫续瑞

责任编辑 姜 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10月第 1 版 2012 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帝王、士大夫家训溯源	9
第二章 汉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	17
第一节 汉代帝王、士大夫家训文献考查	19
第二节 汉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思想内容	24
第三节 汉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文体特点	4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	5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帝王、士大夫家训文献考查	57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思想内容	6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文体特点	92
第四章 唐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	105
第一节 唐代帝王、士大夫家训文献考查	109
第二节 唐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思想内容	114
第三节 唐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文体特点	142



第五章 对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总评	153
第一节 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思想观念的变化	154
第二节 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文体的演变	156
第三节 汉唐帝王、士大夫家训的历史地位	157
附录一 汉唐之际帝王、士大夫家训作品	160
附录二 汉唐之际帝王、士大夫家训论文	215
论文一 从陶渊明的家训诗文看其舐犊之情	215
论文二 从魏晋南北朝文人家训看其理想人格的建构 与实践	225
主要参考文献	235
基本文献及古籍整理成果	235
近人著述	237
后记	239



一、家训的概念界定

家训，顾名思义就是“言居家之道，以垂示子孙者”（《辞源》）。关于家训的概念界定，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至今未达成共识。

谢宝耿先生在《中国家训精华·前言》中引用了《辞源》的上述定义，接着又阐释家训的具体内涵，他认为家训“主要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训示、教诲，也包括兄姐对弟妹的告诫，夫妻之间的嘱托，以及后辈贤达对长辈、弟妹对兄姐的希望要求。其文字记录包括家书、家教、家规、家法、家诫、家范、家风、家订、家礼、家道和遗训等多种形式；其文学体裁有书信、散文、诗词、格言、座右铭等”^①。这里所言“家训”侧重于动态的训诫过程，包含的内容较为宽泛，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家训概念。

当代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中国家训经典·序》中指出“中国古代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包括散文、

① 谢宝耿：《中国家训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诗歌、格言等等,通常称为‘家训’”^①。这里的家训主要指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留下的作品,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家训概念。由于时代久远和条件所限,我们已无法还原历史上帝王、仕宦阶层进行家庭教育的实况,但我们可以通过现存的文献资料探讨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分析其思想内容和文体特点。本书中的家训概念采纳了霍松林先生的观点,研究对象主要是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撰写的家训作品。

二、选题意义

中国有着悠久的家教传统,产生了丰富的家训文献,其中由历代帝王和名臣、名士撰写的家训影响尤为深远,引起了后世的关注。笔者之所以选择“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是这一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文献积累非常丰厚,通过文献梳理,了解作者、作品、文献出处以及重要作品的亡佚情况,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家训提供重要线索。汉唐时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内容极为丰富庞杂,通过具体分析梳理,可以了解帝王、士大夫修身、治学、为政等方面的思想观念;通过分析家训的时代特征,探究家训与官吏选拔制度、家训与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的关系,可以更深刻、全面地了解汉唐之际社会状况与发展变化;通过对家训文体样式、语言风格等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当时的文学史背景以及对家训的影响。另外,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家训的研究来剖析中国家族文化的特质与利弊,更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对当代的文化建设不无裨益。

^① 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其次是这一选题也具有现实意义。通过阅读司马谈的《遗训》，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生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李世民的《帝范》，杜甫的家训诗歌，以及柳玭的《柳氏家训》等家训作品，人们可以获得修身、治学、为人处世的经验，有助于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汉唐以来的帝王、士大夫家训还可以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提供多方面的借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一名对教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高校教师，把帝王、士大夫家训的精华尤其是贤君名臣一生修身治学、建功立业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内容，将有利于当今高校的素质教育。

三、研究现状

中国古代家训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日本学者比较关注魏晋南北朝的家训，尤其重视《颜氏家训》。1968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守屋美都雄的论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出版，该书第二部分《家族篇》的一系列有关《颜氏家训》的论文成为一大亮点，是家族研究发展为家训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1981年安田二郎撰写了论文《王僧虔诫子书考》。1984年吉川忠夫的著作《六朝精神史研究》出版，书中的《颜之推论》通过《颜氏家训》分析了六朝人的精神生活。1990年日本学者守屋洋编著《中国历代伟人家训集》，收录了从周朝的周公旦到清朝曾国藩一共十七人的家训，其中汉唐时期家训作者十人，该书还重点分析了《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

国内研究家训的成果更为丰富。台湾的家训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周法高先生着重从文学角度对汉魏六朝的家训做了研究，撰写了《家训文学的源流》、《读〈颜氏家训〉札记》等系列论文。1992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尤雅姿撰写了博士论



文《颜之推及其家训之研究》，1997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康世昌撰写了博士论文《汉魏六朝“家训”研究》，前者侧重对《颜氏家训》做个案研究，后者对汉魏六朝各阶层家训的内容做全面分析。

大陆关于我国传统家训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著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家训的辑录著述，多是从史书、典籍中爬梳钩沉，再现前人家训的内容，并对其加以汇编、注释。如谢宝耿编著的《中国家训精华》（1997）等40余种，其中收集资料最为全面的是翟博主编的《中国家训经典》（2002）。这些书籍为读者了解家训及史学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便利。其二，家训的研究专著，此类书籍已经开始从治史角度对家训进行理论性的研究，目前数量较为有限，共有徐少锦、陈延斌的《中国家训史》（2003）、王长金的《传统家训思想通论》（2006）、刘光明的《〈颜氏家训〉语法研究》（2006）和戴素芳的《传统家训的伦理之维》（2008）四部。其中《中国家训史》可谓影响最大，堪称家训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家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有关中国传统家训的研究论文则出现较早，数量也较多。

20世纪80年代，相关家训研究的论文10余篇，传统家训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使得一些研究者把研究目光转移到传统家训上，希望能够借鉴其中的优良传统为现在所用，因此该阶段家训研究有了一定发展，论文数量增至110余篇。进入21世纪，伴随人们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家训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广泛关注，论文数量呈现激增态势，共计500余篇。由此可见，30年来，我国传统家训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仅有的10多篇论文发展到21世纪以来的500多篇论文；从对传统家训的单一理论性、介绍性研究，发展到



近年来无论是对内容还是方法都有探索尝试的研究;家训研究文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对传统家训的进一步重视,以及史学研究的发展繁荣。

然而,纵览传统家训的研究成果,整体上我国传统家训研究还局限于文献的整理分析,依然处于尚未成熟阶段。关于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研究有待深入,主要表现为:

其一,总体数量偏少。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门类,我国传统家训研究的文献数量依然偏少,研究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论文更少。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11),仅检索到600余篇古代家训研究论文,其中专门研究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论文仅有130余篇,多数论文集集中研究《颜氏家训》。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系统研究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专著。

其二,个案研究需要拓展范围。目前研究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论文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重点研究《颜氏家训》。但是,汉唐时期有很多帝王和名臣、名士,如刘备、诸葛亮、李世民、韩愈等人的家训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文体特点,同样值得研究。

张艳国在《家训辑览·前言》中阐述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学意义,在介绍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定义、历史分期与文化特点之后,强调了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意义是其中有许多精彩的内容可供我们批判地借鉴、吸收,将它们转化为时代文化的精华。更重要的是作者明确指出了目前传统家训研究的不足:“对于中国传统家训的研究,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以往人们偏重于研究传统文化的其他门类,如饮食、服饰、政治等等,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家训展开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有所注目,并整理了若干种传统家训的书籍出版。但在笔者看来,对它展开有分量的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大系中予以确认,尚待



学者们投入大量的劳动。相信学术界重视研究中国传统家训,并取得若干有分量的成果,为期不会太远!”^①

综上所述,无论是论著还是论文,对传统家训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对中国古代家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的确是学术界的迫切需要。《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是笔者研究中国传统家训作品的第一步。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 本书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

其一,用传统文献学、历史学的方法,融史学、文献于一炉,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通过溯本求源,弄清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的思想内容、文体形式、训诫方式与语言风格的历史演变流程。首先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由汉至唐这一历史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文献考查,在全面、系统地收集这些家训文献的同时考查其出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线索;然后运用归纳法对汉代、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的内容和文体特点进行总结,概括其时代特征;再运用演绎法分析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的社会影响。

其二,纵向比较法与横向比较法。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时代的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纵向关照,又对同一时代的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只有通过两汉、魏晋南北朝与唐代三个时期家训的纵向观照,才能把握其思想内容、文体形式、训诫方式与语言风格的共性特征与时代特征。对同一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家训,通过分析比较,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弄清这些家训作品在思想内容、文体形式、训诫方

^① 张艳国:《家训辑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20页。



式、语言风格上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研究过程既重视个案研究,又注重整体概括;既分历史阶段进行解析,又用通论的方式进行总体把握。

其三,文化学研究法。要想对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增加论文的理论深度,必须注意与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相联系。与此同时,还必须借鉴伦理学、教育学的理论,对家训作品从伦理学、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2.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

本书对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分析其具体内容和文体特点,尤其是对一些名家的家训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可以了解士大夫修身、治学、为政等方面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尝试对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进行专门研究,为家训断代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书在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与唐三个历史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时,既注重分析其在思想内容和文体特点上的内在传承,也凸显了各个时代的特点,并着眼于对一些有影响的大家进行个案分析,力争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全书力求结构完整,层次清楚,既有宏观的理论总结,也有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

五、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素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见长,而充分浓缩其精华的家训文献极为丰富,从汉唐时期的帝王、士大夫家训文本之丰富可见一斑。这些家训作品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值得学者深入研究。笔者十余年间一直致力于汉唐时期家训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在长期的家训研究中不仅潜移默化地受到古人家训思想的熏陶,从中学到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在



摸索中不断总结研究方法,积累研究经验,升华研究心得,深感受益匪浅。治学之路漫长而艰辛,但其中自有乐趣。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和教育者是笔者毕生最大的理想,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家训思想将继续激励笔者执著前行。

然而,本书反映的只是笔者目前所做的一些初步研究,对文献的考查失之于浮浅,对思想内容的研究不够深刻,对文体特点的分析也较为单薄。将不成熟的研究心得总结成书,肯定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各界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促进笔者将研究工作坚持下去。



第一章

帝王、士大夫家训溯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在这些典籍中，家训文献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精髓。正如温克勤所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端蒙养、重家教的古代家训，是颇具特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思想内涵之丰富多彩、表现形式之灵活多样、影响作用之深刻久远，是世界各国文化史上所仅见的。”^①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家训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客观辩证地认识其优劣得失，从而更好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之精华。本章主要探讨中国古代家庭的形成过程和先秦帝王、士大夫家训的起源。

一、中国古代家庭的形成及特点

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家训，首先必须了解古代家庭的产生过程及主要特点。“家庭”作为耳熟能详的名词，其概念很容易理解。“一般

^① 温克勤：《传统家训研究的补白之作——读〈中国家训史〉》，《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108页。



说来,我们中国人习惯把以婚姻和血缘关系(包括血缘关系补充形式的收养关系)为纽带的、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生活共同体看做家庭。”^①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关系基础上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产物和标志。

著名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第三章《家族及私产制度之起源》中说:“上古之社会无所谓家族也。人类之生,同于禽兽,男女无别,亦无名称。……至于伏羲之时,始有夫妇之制。”^②这里的“家族”与“家庭”是同义词。柳先生认为人类在上古时期没有家庭,人与其他动物一样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到伏羲氏时期才有了夫妇的礼制。从传说中的燧人氏到伏羲氏时期,母权制家庭逐渐产生。以妇女为中心的血缘亲族世系是维系氏族的纽带,使氏族组织成为比较固定的集团。由于当时还不是一夫一妻的固定婚制,家庭不过是个雏形。中国的父权制家庭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其特点是丈夫在家庭中承担起对子女的供养任务,财产按父系继承,世系按父系计算。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父系氏族逐渐分裂为若干由男性后裔组成的父系大家庭。父系大家庭实行家长制,这种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只能算是我国古代家庭的初级阶段。但父权制家庭的形成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加速了私有制度产生、阶级与国家的出现。后来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的宗法制度就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根据现存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产生于商代后期,在西周建立以后开始完备和确立。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周公确立的宗法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

① 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16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先秦的家庭也深受影响。徐少锦、陈延斌两位学者在《中国家训史》中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家庭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贵族家庭。它源自氏族或部落首领与其妻妾、儿女们组成的大家庭”“二是依附性家庭。就是依附卿大夫宗族性大家庭的小家庭,主要是农民、农奴的家庭”“三是自由民家庭。自由民家庭作为不同于依附性家庭的独立小家庭,主要是指能够自主地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职业的家庭”^①。这三种家庭类型都有家庭教育,但其对后世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别,其中贵族家庭家训传世文献最多,依附性家庭可查家训资料很少。而自由民家庭中一部分是贵族家庭衰亡而逐渐形成的“贫士家庭”,如孔子及其学生曾皙父子等,由于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并且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家训反而更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家庭以父权为中心,父子关系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父子是家庭的主轴,父子关系作为纵向关系,是中国封建等级制的基础。所以现存的汉唐时期帝王、士大夫家训大部分是训诫子孙的文字记录,如家训散文、家训诗歌等,也有少数训诫女子的作品,如班昭的《女诫》等。下面分别对帝王、士大夫家训做一简单的历史溯源。

二、帝王家训的缘起

中国的帝王家训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朝。周朝王室家训有文王教武王、武王教成王和周公教伯禽等。

文王教武王的家训主要记载在《尚书·酒诰》和《逸周书》等古籍中,家训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要以礼仪引导民众”,二是“厚德广惠”,三是“忠信爱人”,四是“节俭不靡”^②;核心思想是以仁

①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36 页。

②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 页。



爱之心对待百姓，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成就称王天下的霸业。

周武王继位时，其子姬诵（即后来的周成王）年幼，不能教导他为君之道，便把对儿子的期望以格言形式铭刻在器物上。《大戴礼记》卷六载：“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①武王在成王席之四端、几、镜、楹、杖、带、牖、弓、矛等器物上全部刻上铭文，训诫成王，足见其用心良苦。根据徐少锦、陈延斌两位学者的分析，武王上述铭文的主要精神是“要子孙以殷商的衰败为鉴戒，做到依道而行；敬谨谦恭；忍忿制欲；瞻前顾后；伸屈兴废，修身省过；慎言语，免招辱；毋残害，杜祸患，从而永保周室”^②。

无论是文王还是武王，其家训的主旨都是训诫子孙以殷商的衰败为戒，加强道德修养，惠施百姓，永保周室，其言辞之恳切，考虑之周全，保护周室基业之决心，皆令人叹服，其核心精神在周公家训中得到弘扬光大。

周公家训在周王室家训中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主要记录在《尚书》的《康诰》、《酒诰》、《多士》、《无逸》、《君奭》等篇中。作为成王的叔父和老师，周公对成王的教育非常全面，他在“还政成王”之后“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③。他劝诫成王吸取夏、商兴衰存亡的教训，牢记先祖创业立国的艰辛，不要贪图享乐，要体恤百姓生活的艰难，知人善任，勤于求贤。这些观点不仅影响到中国历代王室家训，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价值和意义。

① 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卷六，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 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 1959 年版。